

追寻长安佛教之发展轨迹

——评王亚荣专著《长安佛教史论》

张 淼

古都长安历史时期的佛教是中印佛教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为世人所瞩目。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专题研究，至今尚未得到重视。王亚荣先生的专著《长安佛教史论》（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一书则对这一课题作了很好的探索。该书共收录作者从 1984 年以来 20 年间所发表的与长安佛教有关文章共 21 篇，顺序也按长安佛教的发展历史编排。作者运用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多种方法对长安佛教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有常见的文本研究，也有不少是实地调查的成果。诚如作者所说那样，将这些论文“连缀在一起，能看出（长安佛教）概貌来。”（《长安佛教史论·序》）通读全书，确实可以对长安佛教的发展脉络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而且发现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首次明确而又具体地提出了“长安文化”与“长安佛教”的概念

“长安文化”作为文化学上的一个概念明确地被提出当始于本书作者。关于“长安文化”的概念，作者从两个层次作了阐述，其一是从地域范围上来讲，“长安文化”指的是长安的地域文化，包括城市区、关中区以及周边的辐射区。其二是从历史角度上来讲，可分为渭河文化、三秦文化和长安文化，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多年。除了渭河文化时期与佛教的发展没有关系外，其它两个阶段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长安文化时期，既是隋唐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高峰时期，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代表，佛教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主要角色。同时，作者也进一步阐释了“长安文化”所具有的悠久的传统和极富个性的持续发展特征：“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因而在接受异地文化的佛教上才表现出了比较宽容的态度。”（《长安佛教史论》，第 65 页。）与“长安文化”相对应，作者又提出了“长安佛教”的概念及其内涵，指出：“长安佛教，指的是今天西安地区历史上的佛教。”同时还提出“长安县是中国佛教文化第一县”的观点，凸显出长安佛教在中印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在多维度上展开研究

长安佛教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维度的展现。如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以姚秦到隋唐的佛教发展史中的三条线索为例：1、佛经官译与佛教“中国化”。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典的翻译进行的，从后汉安世高、支娄迦谶翻译佛经开始，到“长安佛教”时期，这种翻译规模越来越大，而从“敦煌菩萨”竺法护到长安已经开始，“长安佛教”的译经出现了源源不断发展的态势，“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出三藏记集·法护传》）到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场的设立，皇帝以国家之力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这就标志着中国佛典官译阶段的开始。大量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语，促进了

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翻译的佛经数量较以前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译经的人员也日趋增多,译场制度也不断完善。在隋唐的佛教译场中,隋代共设立五座译场,唐代共设立十三座译场,诸如道安译场、玄奘译场等,佛教的译经事业基本上是在当朝帝王的支持下完成的。可以说,此时的中国佛教史,就是一部佛经翻译史,佛教正是通过经典的翻译过程逐渐实现了它的“中国化”过程。

2、中国僧官制度的滥觞。姚秦时期,在鸠摩罗什的影响下设立僧官制度。到隋唐时期,僧官已经由中央统一任命,僧官制度直接受朝廷的控制,确立了新的政教模式,成为影响中国佛教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一种组织制度。这些僧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在该书中均有了详细论述,展现了长安佛教在僧官制度建设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以个案研究体现佛教发展的特点。隋朝两代皇帝通过行政命令征召南方的著名僧人进入长安,这不仅结束了佛教的南北朝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促进了南北方佛教的融合,南方重义理,北方重习禅的局面不复存在,佛教出现了一个统一局面,从此揭开了中国佛教发展由初传、滋长时期向鼎盛时期过渡的序幕。作者通过个案研究,揭示出这种佛教文化的传播方式意义所在。诚如作者指出:“鸠摩罗什译场活动是‘长安文化’发展历史上的辉煌点。从比较完整的意义上来说,有典型个案的考察价值。”(《长安佛教史论》,第7页。)正是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凸现出了长安佛教的整体性价值,能够从这些细微之处窥视出在不同时期佛教流传的特点。

第三、注重从政教关系互动的背景下分析长安佛教的发展动向

由于历史上的长安曾经作为十三个王朝的都城,长安佛教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诸如隋代佛教出现了隋文帝以政治力量征召南北各地佛教高僧到长安,以便促进南北方佛教的共同发展;隋代中土僧人中的佼佼者彦琮也是在帝王的支持下完成经典翻译和佛教著述的。而佛教在促进隋代的统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自己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代佛教也是如此,“唐代的统治者一直密切关注佛教的态势,不断地制订政策、修改政策。佛教在唐代一直成长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环境中。”(《长安佛教史论》,第75页。)在这种环境中,佛教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从中反映出长安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重现中国政教关系互动调整的历史痕迹。

第四、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

本书不同于传统的地域性佛教研究方法,即综合性、概述性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使用常规的大而全、面面俱到的研究视角,而是使用了以小见大、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研究方法。这可能是长安佛教研究基础薄弱的缘故。作者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还适当地对佛教的发展状况作了评论,展示出作者数十年来对长安佛教研究的独到见解,从而窥视出长安佛教发展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例如,由于史料稀少,法显的师承关系是个千古之谜。作者采取了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把《法显传》中出现的“汉”、“秦”、“晋”等字的含义进行了辨析,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字的差异及其所蕴含的意义,确定了这三个字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指出:“‘汉’是对祖国统称时所用,在文中有最广泛的时空地域内涵,‘秦’专指北方前秦和后秦时空地域范围,‘晋’则专指南方东晋的时空地域范围。”(《长安佛教史论》,第37页。)从而显现出法显竟然与道安僧团有莫大的关系。

再如,作者在对隋代佛教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指出隋代佛教的整体概貌,从大的方面着力论述隋代佛教发展的状况,但是,作者却独辟蹊径,通过几个典型的个案研究,反映出了隋代佛教发展

的基本状况。例如对日严寺的建造背景、高僧、学派等进行综合研究；区别了在佛教研究史上鲜为人注意的“大兴城”与“长安城”之间的不同之处，全面考证了大兴城的寺院分布、数量、特点以及大兴城译场的状况等。这些都是前人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

该书非常注重佛教经典的翻译，对于经典的翻译情况作了细致而又认真的考证与梳理，例如通过对史料的爬梳，详细分析了鸠摩罗什所译典籍的时间、地点、名目等，并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首次提出玄奘译场组织和助译僧名单、职事的变化、人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过程进行的，因此，研究佛教经典在中国翻译状况是中国佛教史研究必不可少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作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创新价值和积极意义。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佛教的研究已经比较细致、比较深入，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正逐渐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当地域佛教史与断代佛教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时候，人们对于“长安”这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域和断代佛教研究却似乎缺少应有的关注，因此，可以说，王亚荣先生的《长安佛教史论》一书的出版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这将会增进我们对长安佛教的进一步了解，对促进后来的研究者们重视和加强对长安佛教文化的深入、全面的研究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者张淼，1975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佛教心学的智慧

——评陈兵《佛教心理学》

张海滨

有学者曾预言，21世纪将是心理学的世纪。心理学家们研究心理现象，揭示心理规律，医治心理疾病，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令人惊叹的是，已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佛教，拥有大量关于心理的理论，佛陀本人即是一位善于观察、把握自己和他人心灵，从而获得自我解脱并能使他人获得解脱的大智者、“心灵导师”。佛教的“心学”，是人类的无价之宝，对整个人类文化有着巨大的价值，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陈兵教授的新著《佛教心理学》，即是一本对佛教“心学”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的专著。

“心”是什么？“我”是谁？为何我们会思考，有欲望感情？心理和生理、行为、环境究竟是什么关系？“心”的潜能有多大，如何开发……许许多多关于心灵的问题，在这本《佛教心理学》中均用佛教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回答。在《佛教心理学》中，陈兵教授详细介绍了佛法有关心理现象、深层心理结构、心理过程的理论，探讨了心理与生理、行为、环境的关系，更涉及佛教关于认知、人格、情绪、心理健康、心理治疗、死亡心理、管理心理、教育心理、艺术心理、犯罪心理等理论。最令人瞩目的，此书还详尽总结了有关禅定心理、佛教心性论、明心见性之道、清净心、修行偏差心